財產即竊盜

高俊宏

藝術工作者、台南藝術大學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

也許大家都聽過普魯東「財產即竊盜」這句話，實際上這不是空話，例如蚊子館，表面上編列為國家財產，實際上卻也體現為一種竊盜行為，不僅代表了地方勢力的狂歡，同時也代表了後現代這個詞在台灣所代表的不再是美學辯論，而是政治現實。

2010年，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（LSD）共同合作的《海市蜃樓：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》（以下簡稱《海》）第一次發表，確實觸動了許多人，我想觸動的原因，首先是該計畫作為一種「政治藝術」成熟範式，引起許多相關討論，這樣的討論從行動主義到檔案論皆有。但是我想談的不是美學的界定，因為蚊子館代表了美學的徹底從屬性，也不是「政治藝術」這種或多或少依附於西方自由陣營，以及保守左翼「永遠無法結束」對立狀況下的政治殘渣類型，反過來說，我想談的是藉由蚊子館，台灣究竟存在何種糾結的政治力量，而這些政治力量將美學恆常地無用化。

2010年，南方朔回應《海》的〈必先有蟑螂，而後才有蚊子！〉一文中，從公共工程的預算浮編、發包結構中，精準地抨擊公共工程從機制面就出了問題，提出蚊子的出現是因為背後「蟑螂飛舞成一片」。這正是今日公共工程巧妙之處。公共工程經由不真實的「公平」機制，實際上演化成一套雨露均霑的法則，精巧地平衡了各種地方勢力的慾望結構，唯有這麼複雜的環境，蟑螂才得以生存。近來的大埔事件就是地方蟑螂飛舞的最佳解釋，代表著戒嚴體制滑向以地方勢力為主導的土地掠奪戰爭，並用日新又新、難以想像的方式進行著資本重分配。克勞塞維茨（C. V. Clausewitz）講到戰爭是政治的延長時，其意思是說，戰爭包含於各式各樣、對內或對外的政治技術之中（這些技術最終通往民族主義的建構）。然而今日克勞塞維茨的說法消失了嗎？我認為沒有，只有古典的戰爭轉型為「多樣化」（diversified）而已，無論是古典戰爭或者今日暫且名之為多樣化戰爭的政治手段延續，其背後維繫著一個古老而顛撲不破的問題：資本如何重分配？因此不能說今日蚊子場館僅僅體驗了政治作為一種誇富宴（potlatch）的表現，精確地說，它代表了90年代台灣政治轉型成富豪階級（plutocracy）的狂歡式掠奪及重分配，事實上從太平洋島嶼的誇富宴，一直到台灣的「賽豬公」、大型中元普渡等儀式中，誇富扮演著一種精密的交換、互酬以及「靈」的推移過程。今日的資本重分配並不透過耗費來進行（這種行徑目前只符合藝術性的精神、體力勞動想像），而是創造多樣化的「空無」概念來創造資本。

各種進階版的蚊子館

廢墟常被認為是一種巴洛克式的啟蒙，作為理性啟蒙的歧義，巴洛克存在著狂歡式「世俗啟蒙」的涵義，廢墟作為一個表徵，體現的是理性設計在衰敗之後所形成的解放域，也展露那些以理性為名擊劃各種偉大計畫的背後，終究是一片空無。什麼是「空無」的多樣化？從土地開發的角度而言一點也不難理解，舉兩個例子：前陣子因為同時進行著一個有關廢墟的創作計畫，我發現位於宜蘭運動公園一帶、曾經發動過三波「菊花作戰」的神風特攻隊舊機場（該時期的台灣神風特攻隊被稱為白蝴蝶），現已被開發為宜蘭科學園區（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城南基地），附近仍遺留數個當時掩藏自殺飛機的機堡，以及一個孤零零的機場八角塔（古蹟）被棄置在園區中，如今空盪的科學園區出現招商困難的情形，一直到今年才以免費提供場地、協助創業輔導與創投資金等幾乎半買半送的方式催生了諸如「飛天小女警」、「客流感」、「科技一把罩」、「ANITIME Project」等光從名稱難以辨識內容的廠商進駐，可是宜蘭園區附近的房價因此水漲船高卻是事實，很難令人不聯想到炒地皮，同時，我很難形容「飛天小女警」與「客流感」同時進駐以往被稱為「白蝴蝶」的神風特攻隊基地的景象到底有多荒謬，這種荒謬感就好像往年國稅局在4月「納稅季節」來臨之前會派出「國稅小天使」來感化新貧階級守法繳稅一樣，令人感到生不如死。

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新竹世博台灣館那顆天燈，近日在與某位新竹文化局員工聊天時，獲知兩年前新竹市長耗費巨資從上海世博會「接引」台灣館的巨型天燈回台。今年初因為參展的關係，我在上海當代藝術館佈展，每天從地鐵4號線的西藏南路站附近旅館徒步前往黃浦江邊的展場，途中總會經過好幾大塊用圍欄圈起來，散布、堆積著許多奇怪廢棄造型物的大空地，彷彿中國剛剛擊落了一個外星艦隊，可是空地附近明顯長出許多新式樓盤，原來這一帶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場地，台灣館的天燈也羅列其中，共同成為都市仕紳化的共犯玩具。2011年這顆天燈玩具被接引來台，抵台後不久即委由「環球購物中心」經營，屬於令人眼花撩亂的促參惡法項目中的「OT」，其名稱也正名為「環球新竹世博店」這種不三不四的名稱，文化局員工告訴我，新竹人連小孩子都普遍厭惡這顆怪球，這顆怪球天燈過去被地方稱為「捕蚊燈」，意思就是說那即將是一座文創思維下的蚊子館，而今日在成為捕蚊燈之前，反倒被環球商場給「全球化」了。

化即為新自由主義（作為古典自由主義的還魂），之所以在台灣90年代初期邁向成熟，一方面，除了依附、牽動於整體東亞趨勢（該時期韓國漢城奧運後的「世界化」策略、日本在自由經濟制度下廢除國營企業、中國走向自由經濟開放等等），1984年9月，俞國華甫就任行政院長時，便於立法院公報發表自由化、國際化、制度化的自由經濟策略；另一方面也與1987年「黨禁」的開放所造成的地方黑金勢力「漂白」、直接壟斷地方土地、公共資源有關，所有土地開發的慾望都被「繁榮地方」的口號所掩蓋，而這種地方勢力漂白經營地方資源的模式，基本上就一直延續至今。今日，與陳東升在1995年的圖表明顯不同的是，以文化治理為名的「準蚊子」、「半蚊子」館及園區開始崛起，文化治理作為一種新的投資項目，當然不會被地方勢力所忽略，在姚瑞中《海市蜃樓III》的目錄裡，文教中心以及觀光、展示中心的蚊子館代表了類似的趨勢；另外一個文化治理的表徵建築便是各式各樣的文化創意產業園區，代表了公部門無力經營空間，擔心公共建築蚊子館化所祭出的商業化、私有化手法；再舉一例，過去由於經常一日行走的緣故，我特別喜愛宜蘭，兩年前有一次無意間在頭城車站前面見到剛整修過的台鐵員工宿舍，令我為之驚艷，該宿舍由檜木及杉木構成，地面依照日據時期的法令提高60公分，是頭城地區唯一長條式木構造的日式建築宿舍，兩年後再度經過頭城，想再去日式建築以及附近開放式廣場逛逛，但還未走進廣場被咖啡館員工趕了出去，因為原本的公共、開放式廣場及日式建築已經OT成為收費的咖啡館。

「財產即竊盜」及其他

普魯東的「財產即竊盜」（Property is theft!）事實上源自於與竊盜矛盾的概念：「財產即自由」（Property is freedom），在資本運作的世界中，私有財產根植於人們的生命概念中，人們因而對於財產不自主地產生敬意，可是財產要發揮作用必須與「物」（good）產生聯繫，以毀壞「物」作為象徵財產擁有的行為；可是另一方面，約莫1850年起，法國重農學派（Physiocracy，自然治理）所提出的自由放任概念——「讓他去」（laissez-faire）的經濟概念開始——像洪水一樣席捲世界，不僅影響了亞當·斯密在《國富論》提出的樂觀經濟學，其價格機制的「無形之手」自動調控的機制，以及自由放任的概念，影響了往後美國一極為特殊的思維脈絡，也是我認為對於今日全球流動資本機制具有極佳參考性的「無政府資本主義」。羅斯巴德（M. N. Rothbard）在《自由的論理》（The ethic of liberty）裡做了代表性的陳述，他認為自由市場已經充分證明，其能在無政府（stateless）狀況下完好運行，而自由的概念必須

建立在私有財產權之上（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）；「罪」的概念則來自於侵犯或毀壞他人的私有財產，他指的侵犯者不是人，而特別是指國家。這兩種矛盾皆由「個人」作為軸心，代表台灣在解嚴以後正式跨入金權帝國的時刻，反映在政府、地方財團與民眾之間的矛盾，可從這兩種無政府主義的矛盾視之，前者朝向互助（mutuellisme）的無政府主義，後者朝向無政府（stateless）的個人金錢主義。

傳統的蚊子館也好，蚊子園區、都市更新也好，或者新型態、空洞的文創產業也好，我們除了理解它作為上述種種無政府資本主義的流動，或許還不如讓我們重新想像今日的無政府主義，特別是當代的藝術除了逐漸傾向展演化、娛樂化之外，有沒有可能更具體地指向一種威脅體制的行動，姚瑞中及LSD的蚊子館踏查及出版行動，做了令人稱羨的示範。